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一

四部要籍選刊

蔣驥翔主編

浙江大學出版社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等奉

勅撰

尚書序

釋文此孔氏所述尚書起之時代并敘為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為音

疏

正義曰道

本冲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恆羣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鈴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為著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皆定章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即書為法所準刻之事皆有書為注以疏為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名以

四部要籍選刊

蔣鵬翔 主編

阮刻尚書注疏

(清) 阮元 校刻

一

浙江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阮刻尚書注疏 / (清) 阮元校刻 ; 蔣鵬翔主編. —
杭州 :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308-13454-5

I. ①阮… II. ①阮… ②蔣… III. ①中國曆史—商
周時代②《尚書》—注釋 IV. ①K221.0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4) 第 143093 號

阮刻尚書注疏

(清) 阮元 校刻 蔣鵬翔 主編

-
- | | |
|------|--|
| 責任編輯 | 張 鵠 (zgzu@zju.edu.cn) |
| 特約編輯 | 解旬靈 |
| 封面設計 | 溫華莉 |
| 出版發行 | 浙江大學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號 郵政編碼 310007)
(網址: http://www.zjupress.com) |
| 排 版 | 杭州尚文盛致文化策劃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浙江海虹彩色印務有限公司 |
| 開 本 | 850mm×1168mm 1/32 |
| 印 張 | 41.25 |
| 字 數 | 607 千 |
| 印 數 | 0001—1200 |
| 版 次 |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 書 號 | ISBN 978-7-308-13454-5 |
| 定 價 | 200.00 元 |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裝差錯 負責調換

浙江大學出版社發行部聯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傳古樓據上海圖書館
館藏清嘉慶刻本影印
原書版框高一七一毫
米寬一二二毫米

阮刻尚書注疏出版說明

蔣鵬翔 周煦陽 合撰

《附釋音尚書注疏》二十卷，題孔氏傳，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領銜）疏，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刻本。因其校刊主事者爲時任江西巡撫的著名學者阮元，故一般稱之爲阮刻《尚書注疏》，屬阮刻《十三經注疏》之一「二」。

《尚書》是我國最早的政事史料彙編，基本內容是虞、夏、商、周君王的文告和君臣的談話記錄「二」。它是儒家經典中篇卷、文字問題最多的一種，從西漢至北宋，新本迭出而舊本屢佚，原始字體也因改寫爲通行字體而失傳。擇要言之，該書曾出現過四個篇卷系統、五種字體類型，紛繁複雜，於斯幾極。

現在確知的第一個《尚書》傳本系統是伏生今文本，以隸書書寫。《漢書儒林傳》記曰：「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

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根據劉起鈇《尚書學史》的解釋「三」，朝錯（鼂錯）在伏生處抄得《尚書》二十八篇（伏生所傳止二十八篇，《儒林傳》所以稱二十九篇，是因為加入了漢武帝時民間進獻之《泰誓》一篇的緣故），入藏漢王朝之秘府，這就是後來幾次用以校其他《尚書》傳本的『中秘本』。朝錯只是抄錄遞藏經籍本文，未能傳承伏生的學問，真正受業於伏生，解釋《尚書》經文章句而成一家之學的是濟南的張生和歐陽生兩人。歐陽生於漢武帝建元五年立爲五經博士，其學大顯於世，宣帝時又增立大小夏侯兩家，此即今文『三家』，而歐陽氏學仍爲其主幹，故東漢靈帝熹平四年始刻太學石經，《尚書》即用歐陽家經文（校記存大小夏侯兩家異文），成爲當時的定本。熹平石經原石至唐初已毀滅殆盡，全文拓本也早已失傳，其中《尚書》現存一千零二十六字，分屬二十三篇「四」。

歐陽生事伏生，授倪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漢書·儒

林傳》)。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漢書·武帝紀》）。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初，《書》唯有歐陽，……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漢書·儒林傳贊》）

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後漢書·儒林列傳》）

第二個系統是西漢古文本。漢惠帝四年除挾書律，古書舊籍逐漸重現於世，其中有用戰國東方六國文字書寫者，時人艱於識讀，概稱『古文』。據記載，西漢古文本曾有孔氏家傳本、中古文本、河間獻王本、張霸偽造『百兩篇』本等多種記載，而以孔氏家傳本爲代表。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漢書·儒林傳》）

孔氏家傳有先世用古文抄寫的《尚書》，孔安國取與今文《尚書》對讀並進行整理（歐陽生的學生倪寬也曾向他學習今文《尚書》），將這種難以識讀的古文改寫爲當時通行的隸書（今文）。孔氏家傳本可能與傳說中孔子舊宅牆壁中發現的『孔壁本』、西漢末年劉向校書所用的皇家收藏的『中古文本』有密切的關係，但目前尚未見史料對此關係作出確切的說明，不過根據《漢書·藝

《文志》的記載，孔安國曾用孔壁本對比今文本，發現其在今文本二十九篇之外，又多出十六篇。

第三個系統是東漢古文本。所謂東漢古文本，一般指杜林所傳的漆書古文本。杜林在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然後以其字體爲樣本，將當時通行的今文二十九篇本改寫成古文，在改寫過程中，又將《盤庚》、《泰誓》各析爲三篇，從《顧命》中析出《康王之誥》一篇，於是變爲三十四篇，而其實質與二十九篇今文本相同，並未新增篇章，不過變化字體而已。此本賈逵、馬融、鄭玄等人皆曾作注，影響極大，魏齊王正始二年，以古、篆、隸三種字體刻立石經，其中《尚書》即用東漢古文本。

上述三個系統的版本均已亡佚，唯一完整流傳至今的是東晉初年豫章內史梅賾進獻的孔傳本《古文尚書》。

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賾（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近唯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爲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經典釋文·序錄》）

孔傳本共五十八篇，包括西漢傳下來的今文三十三篇（伏生所傳本爲二十八篇，此本分其《堯

典》下半爲《舜典》，《皋陶謨》下半爲《益稷》，《顧命》下半爲《康王之誥》，《盤庚》分爲三篇，故得三十三篇）和僞撰古文二十五篇，每篇皆有『孔氏傳』並附書序，又有用西漢孔安國口吻寫成的序文一篇，冠於全書卷首。除篇章增加之外，此本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是開始用隸古定字體書寫經文。所謂隸古定，即指以隸書筆法轉寫古文字形（現代古文字考釋稱爲『隸定』）。之所以要用這種奇怪的字體，是因爲作者欲藉以彰顯該書的古老不凡，與後世通行文字傳錄者有別，陸德明就因此相信它是『真古文』，並爲之作《音義》，孔穎達奉唐太宗之命主持編撰《五經正義》時亦以此本爲基礎，所以《經典釋文》、《尚書正義》的經文本來都是隸古定字體。

不過這種怪字畢竟難以識讀，故天寶三年唐玄宗又詔令衛包改經文『古文』（隸古）爲『今文』（楷書），成『今文尚書』（漢之今文爲隸書，唐之今文爲楷書），文宗開成二年刻石經，其《尚書》即此種『今文』本。宋太祖開寶五年，李昉根據通行楷書本校定《經典釋文·尚書音義》，刪去大多數與隸古字有關的內容。此後，隸古字及原本《尚書音義》失傳，今文孔傳本的面貌則完全定型，流傳至今。

孔傳本之真偽是經學史上一大公案。宋之吳棫、朱熹，元之趙孟頫、吳澄，明之梅賾，清之閻若璩、惠棟，皆對此問題之發明有所貢獻，其中以閻氏《尚書古文疏證》一書影響最大，故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五節『閻若璩和胡渭』許之爲『思想界之一大解放』，劉起野《尚書學史》第八章第二節第二小節經題爲『閻若璩的疑辨終於推翻偽古文』。此後偽撰者之身份雖猶衆說紛紜，而孔傳本作偽之說則成定讞矣。

然而上古典籍之真偽，並不是非黑即白的簡單判斷。陳寅恪先生曾云：『古文《尚書》，絕非一人可杜撰，大致是根據秦火以後所傳零星斷簡的典籍，採取有關《尚書》部分所編纂而成，所以我們要探索偽《書》的來源，研究其所用資料的可靠性，方能慎下結論，不可武斷的說它是全部杜撰的。』『五』與其真偽相比，更值得注意的是孔傳本何以取代此前的諸多版本，成爲唯一完整流傳至今的本子。

魏晉經學能突破漢儒藩籬，廣采博收，又使神秘化的今文經學轉爲哲理化，又比古文經學更注意於訓注的詳審、經義的闡明，而且能更通達地表述經義，這就構成了魏晉經學的特色，使這幾部重要經注一直傳到現代。這部『孔氏傳』《古文尚書》就是魏晉經學中傑出的一部。

這部偽孔氏《古文尚書》總結和承襲了漢代經學的全部成就，益以魏和西晉以來各種經說，着重把古文家所推崇的聖道王功貫串在全書經文和傳注中，同時加進了自己時代所需要的東西，主要表現為下列兩方面：（一）特別強調維持封建綱常，有助於本朝瀕危的政權不被人奪取。

（二）編造一脈相承的聖道，對儒家哲學理論作用甚大。

由於這部《尚書》在樹立儒學道德說教中有着如此重大作用，加之這部《尚書》不像西漢今文經學漫無邊際的神秘而空疏的雜說，也不像東漢古文家如衛、賈等人故意和今文家立異而造作的古《尚書》說，而能對每章每句都加以梳理、條析，用簡潔的文字做到每句都有解釋，幾乎達到當時『今譯』的地步，這在《尚書》學上是一個超越以前一切著述的最優異的成就，因此人們樂於接受。孔穎達《尚書正義序》說此書『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道出了當時人們對此書的讚美之情。大家一方面高興於它經文的完整，一方面喜歡它訓注的明晰與釋義的弘雅，就把它看成是漢代出於孔壁的真古文和孔安國的真注釋，再經過王朝的提倡，它很快被立於學官，作為國定課本傳習，於是這部出於東晉初年的冒牌《古文尚書》，就取得《書經》的正統地位，一直傳到近代〔六〕。

上述文字闡述孔傳本《尚書》的學術價值甚爲明晰，本書影印的《尚書注疏》就是在孔傳本的基礎上編撰而成，故不避辭繁，鈔錄於右。

阮元校刻《尚書注疏》的底本是其家藏十行本，傅增湘《校金刊本尚書注疏跋》云：『《書疏》自來傳世者以十行本爲最古，然其版多出覆刊，又經正德修補，差失滋多，以致注、疏錯雜紛亂，爲世訾謗』〔七〕，所指即此本，關於其源流、性質的考釋可參看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第六章『建陽坊刻十行注疏本及其他宋刻注疏本』。

清嘉慶初年，阮元設詁經精舍，延請學者分任校勘《十三經注疏》之事，其中德清貢生徐養原負責校勘《尚書注疏》，成《尚書注疏校勘記》。嘉慶二十年阮元主持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由武寧貢生盧宣旬選錄部分《尚書注疏校勘記》附刻於正文各卷之末。據喻遂生統計：『阮校單行本《尚書校勘記》共收校記三三九七條，盧宣旬選入阮刻本一千七百零四條。……阮校的內容，主要可分爲校版本異同和校底本正誤兩類，盧氏大量錄入了前者，而有些影響閱讀的校正訛誤的校記反未選入，這不能不說是阮刻本的一個缺陷。』〔八〕然與盧氏的檢擇失當相比，更可惋惜的是當時所用參校諸本中關鍵版本的缺失。

《尚書注疏校勘記序》所列參校版本爲：唐石經、宋臨安石經、古本（《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岳本（清乾隆武英殿翻刻相臺岳氏本）、葛本（明永懷堂刻本）、宋板注疏合刻本（《七經孟子考文》所引）、閩本（明嘉靖李元陽刻本）、明監本（明萬曆北京國子監刻本）、毛本（明汲古閣刻本）。其中經、注、疏之刻本，校勘者得以利用的除用作底本的元刻明修十行本和《七經孟子考文》所引校記外，就只有明代諸叢書本了。縱觀當時五經注疏校勘者所見版本之年代，《周易》用傳校宋刻單疏本、傳校注疏合刊宋刻八行本，《毛詩》用宋刻十三行小字經注本，《禮記》用惠棟傳校宋刻七十卷本，《左傳》用《春秋經傳集解》宋刻殘本、北宋刻小字本殘本、南宋淳熙時刻小字本、南宋相臺岳氏本（當時以爲宋刻，實係元刊）、宋纂圖本以及《春秋正義》南宋慶元間吳興沈中寶刊注疏合刻本，四經可用校勘材料都比《尚書》要優裕得多「九」。由於文獻條件的限制，阮刻《尚書注疏》的校勘質量未愜人意，故喻遂生在《尚書正義點校札記》中列舉了大量阮刻漏校、誤校的例子，黃懷信《尚書正義校點前言》也不無得意地說：「這次校勘，所據校之舊本凡一十一種，參考前人校勘成果凡一十四家。另外，一些引文還查校了原書。總之材料不可謂不多，但最終之校記卻不如阮多。主要原因，是底本較好。」「十」

徐養原校勘《尚書注疏》時遺漏舊本甚夥，其中最可惜的是《尚書正義》宋刻單疏本和《尚書正義》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經注疏合刊本，前者保留了未經經注竄亂的唐疏原貌，後者則爲《尚書》經注疏合刊之祖本，皆《尚書》版本系統中至關重要者。此外，《附釋文尚書注疏》宋魏縣尉宅刻九行本、《尚書注疏》金刻十三行本等具有較高校勘價值的善本也未及利用〔十一〕。阮刻校勘欠佳，當時經眼舊本太少無疑是主要原因之一，然而細辨所遺各本之出處，卻又情有可原。宋刻單疏本藏於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至清光緒時始由楊守敬帶回中土，這兩個本子徐養原當然都看不到，宋魏縣尉宅刻本藏於故宮〔十二〕，傅增湘所見金刻本『舊出清內閣大庫』，也非民間校書所得見者〔十三〕，因此阮校成書時未能參考上述善本之失，實由當時客觀條件限制所致，若以歷史的眼光看待此問題，自當於古人懷有理解之同情，不會妄加疵議，更何況在古籍整理過程中能夠方便地利用文物性善本並不是產出高質量學術成果的充分條件，新中国成立以後的同類著作也已經多次證明了這一點。

上述版本中，《尚書正義》宋刻單疏本今有一九二九年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影印本及翻印日本印本的《四部叢刊三編》本，《尚書正義》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有《古逸叢書三編》、《中

華再造善本》影印本，《附釋文尚書注疏》宋魏縣尉宅刻本有一九八九年臺北『故宮博物院』影印本，《尚書注疏》金刻本有《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民間學者都已不難看到，倒是影印清嘉慶阮刻原書的出版物較爲少見。從文物屬性的角度考量上述舊本與阮刻本，其間差距自然判若雲泥，但後者亦有其自身獨特價值：其一，阮刻本合刊經注疏文與校勘記，正文恪守底本面目，校記羅列衆本異同，其體例之謹嚴，前所未有；其二，阮刻本代表了清代校理經籍的較高水平，是研究清人校勘理論與實踐的第一手材料；其三，阮刻成書近兩百年，傳播廣而影響巨，至今絕大多數相關研究仍以之爲立論基礎，欲與同道展開對話，也必須熟讀阮刻本。

此次影印，取上海圖書館藏清嘉慶阮刻本的早期印本爲底本，掃描付梓，或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坊間宋本易見清本難求的困窘。與過去同類印本相比，本書出處分明，影印清晰，既便閱讀，亦堪信用，希望能得到廣大讀者的理解與支持。

注

「一」本文為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立項資助項目『古籍影印出版的技術探討與前景展望』（項目編號：12YBA007）研究成果。

「二」關於《尚書》的定義，衆說紛紜，以周秉鈞《尚書注譯》（嶽麓書社二〇〇一年版）『前言』所述較為簡明，今用其說。

「三」劉起鈞《尚書學史》，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版，第六九頁。

「四」劉起鈞《尚書與歷代石經》，《史學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五」轉引自俞大維《懷念陳寅恪先生》，文載《陳寅恪印象》，學林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六」劉起鈞《尚書學史》第一九七至一九九頁。

「七」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第一一頁。

「八」喻遂生《尚書正義點校札記》，文載《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二八卷第四期。

「九」十三經中的另外八經，其地位、影響與五經差異明顯，討論其參校版本之衆寡又另當別論。

「十」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

「十一」傳增湘《校金刊本尚書注疏跋》稱宋魏縣尉宅刻九行本『寫刻俱精，附陸氏釋文，當爲十行本所從出』，以此金刻十三行本校明北監本，『各卷匡繆拾遺，指不勝屈。』

「十二」《天祿琳琅書目》僅於正編卷五著錄元刻《尚書注疏》一部，不見宋刻，則此本在清嘉慶二年以前或未入藏內府（嘉慶二年彭元瑞等奉敕撰《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仍未載此刻），其流傳經歷待考。

「十三」《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著錄之《尚書注疏》金刊本，與傳增湘所見者行款相同而卷帙較爲完整，此本卷端鈐『平陽汪氏藏書印』朱文長方印，係汪士鍾舊藏。汪氏又與阮元交好，曾獲贈聯云：『萬卷圖書皆善本，一樓金石是精摹。』則此金刻本實爲當時諸種珍本中最有可能爲校經人利用者，然校勘記中未載此本，大概這難得的機會也終於錯過了。